

訪問：李鎧揚 王文昕，記錄整理：王文昕 李鎧揚 《國史研究通訊》11 期 國史館 2016 年 12 月 p. 83- 93。 李鎧揚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王文昕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訪談時間：2016 年 1 月 13 日，3 月 15 日，8 月 2 日 訪談地點：臺北市臨沂街楊宅。

背景說明：劉秀華女士出生於 1921 年 5 月 20 日，是臺南劉瑞山（註 1）的五女兒。劉女士在戰前先後就讀臺南第一高女與日本女子大學家政科，（註 2）1000 年與臺中清水出身且同樣有留日背景的楊基銓結婚。楊基銓為日治時期少數擔任高等官之臺灣人，戰後亦歷任臺北市建設局長、土地銀行、華南銀行董事長與經濟部次長等職，卸任後獲聘總統府國策顧問。本次訪問以劉女士日治時期的家庭生活 and 求學經歷為主，並特別著重日常飲食生活與留日期間家政課程的經驗。*（）內文字為訪談者補充。

一、幼時的飲食生活

我是臺南人，出生於大正 10 年（1921），父親劉瑞山經營「和源」商號，是地方上非常有名的人物。父親有三位太太，育有七男五女，其中和我同一母親的有三男三女。父親很早就受洗為基督徒，因為信仰的關係，家中飲食習慣和傳統漢人不太一樣，例如很多臺灣人因為農耕的關係，對牛有感情，不太吃牛肉，我們家則沒這個禁忌。父親在臺南開設事務所，就是現在臺南有名的「劉瑞山古厝」，日治時期劉家人都住在古厝和隔壁，每到用餐時間會搖鐘，讓全家人聚集在古厝用餐。（註 3）古厝用餐因為事務繁忙，雇用很多職員，中午用餐時家裡會準備三桌菜色，一桌是主人桌、另外兩桌是員工桌，主人與員工不一起用餐，而是由主人先吃，吃完才換店員，菜色大體一樣，不會因為老闆與員工有太大差異，主要是因為店內生意需要人手，因此採用輪班用餐的方式。我還記得當時請來煮飯的傭人很會煮，不論什麼菜色都相當美味。我小時候很喜歡遊玩在「厝內」與事務所之間，父親當時在事務所內擺著一個烘爐或鍋爐煮牛肉，讓大家在飢餓的時候可以隨時享用，不論是客人或店員都可以吃。我到事務所玩的時候，如果餓了會自己或請傭人幫我取少許牛肉來吃。我有一個姊姊很愛吃肉，但我則偏好吃蔬菜，吃肉則是隨意，不會特別強求。因為父親的關係，家中的飲食應該比當時一般人好一點。那時雖然知道有牛奶這類的飲品，但家中很少喝，還是吃牛肉比較多。或許是因為營養比較均衡，我從小就不太生病，家裡人體質都不錯、都很長壽，營養還算充足。

二、求學經歷

昭和 9 年（1934 年），（註 4）在我將要上學時候，父親讓我就讀日本人為主的小學校「花園小學校」，（註 5）而非臺灣人為主的公學校。當時我讀的小學校幾乎沒有臺灣人，原先有一位，但她後來轉學到高雄去，所以只剩下我一人，我可以說從小就很習慣與日本人上課。當時上課不像現在有營養午餐，中午都要學生自己帶便當，也不蒸便當，午餐基本上以冷飯為主。小學兩人共一桌，可以清楚觀察到彼此菜色，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同學吃飯時會用便當盒的蓋子來裝茶水喝。因為我是臺灣人，有時候便當菜色會和日本同學有一點點不同，我

很不喜歡 不一樣，因為這樣會讓日本人看不起，因此 回家會告訴母親盡量做日本菜色的便當。幼時在學校附近有一間專門賣日本商品的販售處，臺日人都可去買，我母親也會去，但大部分還是日本人去買。我現在依然記得他們會賣「鯛の子」，「すずの子」等等食物，看起來非常好吃。我看同學便當都帶這個，就叫母親買給我帶；我看同學煎蛋方式和臺灣不一樣，就回去教媽媽作，不想被日本同學看不起，不想和別人不一樣，因為臺灣人在小學校是少數的關係，因而有些自卑感，在這方面很敏感。我記得小學時，主恩華人聖經教會舉辦「義賣會」（Church Bazaar）販售兌換券，我把兌換券拿去學校賣給同學，沒想到被老師發現，受到責罵並挨了一頓痛打。

在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級主任曾特別叮嚀：「劉，妳是臺灣人，若無特別用功，無法考上臺南一女中。」這句話深植我心中，也促使我更加用功，身為臺灣人，不想輸給日本人。我在花園小學校讀完後報考臺南一女，（註 6）也如願考上，為此我感到很榮耀。幼時的成績很好，但或許是因為臺灣人身分緣故，我在臺南一女就讀時期班上的第一名總是日本人，多數時間我只能得到第二名，一度讓我有點灰心。但即使如此，課業依舊保持前茅，現在我還保留當時的成績單。在臺南一女時到了三年級有「家政課」，會有老師教我們學作菜，當時課程教授以西洋式或日本式料理為主，上課的時候會先由老師講授今天的料理名稱與做法，接著再讓我們實際操練料理方式。我不記得是否有先上日本料理或西洋料理順序的記憶，想要作什麼料理應該是由老師安排。

三、日本女子家政大學的留學經歷

臺南一高女畢業後，在家人的支持下，我隨著姊姊的腳步赴日就讀日本女子大學家政科。

（註 7）日本女子大學創立於 1901 年，此大學原本就是為了女子而建，創辦者是成瀨仁藏。

（註 8）成瀨認為國家若要強大，婦女的教育很重要，女子要有教養、有常識，國家才會強，因此希望培養有教養、學問、概念和基本常識，且能將這些應用在家庭的女性。因此相對於 1918 年成立的東京女子大學旨在培養專業能力，日本女子大學更重視婦女基礎學識的養成，東京女子大學比較專業、英文較強，其學生志在成為職業婦女者較多，而日本女子大學畢業生通常會選擇成為家庭主婦，以家政科為重點，在教學上不會很嚴、也較少考試，因此雖也有教英文，許多學生只求考試通過、能畢業就好。我之所以選擇就讀家政科，除了姊姊已經就讀外，與其說是個人興趣，更多是出於一份希望不要讓家裡人丟臉的「責任感」。

當時學校的名稱雖然是大學，其實在學制上應該比較接近專門學校，我就讀當時的校長是井上秀子（註 9），印象中她常常穿著一襲洋裝。在學制方面，日本女子大學有國文科、英文科、家政科。當時女大很重視家政科，分為三個類組。一類是四年制、不嚴，畢業後無法取得學位；我讀的是二類。二類同樣為四年制，較嚴格，畢業後可以取得學位，主要目標是將學生培養為老師，入學時要看課成績，百分之前五可獲得推薦念二類，通常二類的學生較聰明。當時就讀二類的學生可分兩種，一種是聰明的有錢人，主要是為了取得文憑，一種是家境較差，將來想要做老師賺錢。最後是三類，為三年制，記憶中該類課程較為鬆散，

當時有來自臺灣、朝鮮、滿洲國、中國的學生。（註 10）當時日本女子大學的臺灣人寥寥可數，只有一位臺灣同學敏子（按：臺灣名為張敏英）和我是同科不同班，她在就讀期間就結婚了，最後並未完成學業。她當時嫁給了霧峰林家的林正雄，林當時在慶應義塾大學就讀。在日本留學時，雖然學生宿舍不能自己煮，但我們的學生家庭背景都還算不錯，手頭也還算充足，除了學校食堂外，也會到校外的料理店用餐，或是住在朋友家，和她們家人用餐。我

從小學到大學都讀日本學校，只能交日本朋友，沒有臺灣朋友，覺得很孤單。等到從日本回到臺灣以後，才有機會結交臺灣朋友。我在日本女子大學時結識一位室友立花敬子，是九州人，小我兩屆，後來嫁給醫生，生活也過得很好，我們當時想法與個性很合，至今仍有聯絡往來，平時會打電話來聊天，今年（2016）元旦還和孫子一起來臺遊玩。敬子很喜歡臺灣的皮蛋、白斬雞，算一算我們認識超過了八十年光陰。

四、日本女子大學的課程與辦學理念

我們的學校很親切，教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由於創辦者以女子教育為重點，第一項重點不是學問，而是教做人的學問，所以有冥想課，教我們閉目冥想，算是一種精神教育。我記得當時宿舍很大，在一座山裡，有好幾棟屋子，且分為不同建築風格，日本式的一間，裡面是和室；洋式的兩間，有四層樓，比較有錢的學生住在洋樓。（註 11）

我們學校沒有專任教師，都是外聘的，像是我們經濟學就是請慶應義塾大學畢業的高橋誠一郎（註 12）教導我們「經濟原論」。我就讀家政科，學校有安排營養課和家庭管理課程，但這兩科是沒在考試，而是你一個小時要做多少事，用這樣教導訓練。我知道熱量（カロリー）這個概念，但是當時在學校沒看過熱量表，那應該是之後才有的東西，那個時候是戰爭時期，戰爭中都沒東西吃，根本沒人在計算熱量的，越好吃的越好。日本女子大學的家政課中沒有教過計算熱量，也不考試，課堂教導的是一個概念，讓你回去自己應用，會用的人就會用，就像上建築課時會讓你畫圖，教你要蓋房子要用那些材料和方法，但教完後有沒有吸收、會不會用，則要看學生自己了。在就讀家政科時，除了料理課程外，還有「營養課」。因為年代久遠，我只記得當時有一位姓中村的女老師來替我們上課，她當時有營養師的資格，因為年代久遠，上課奶油麵包蠻好吃的，另外學校附近還有一家內容也不太記得，只對老師說番茄與小黃瓜很有營養還有印象。儘管課程印象已經模糊了，但我仍記得在以後的生活中，有許多營養的知識是從日本女子大學家政科學來的。

五、女大時期的宿舍生活

我就讀女大一個月生活費大概 30 圓左右。（註 13）當時父親是糖業公司的股東，其由糖業股票獲得的錢匯到日本，用於支付我的學費，我若需要就從那裏領，所以並不清楚一學期學費多少，都是有需要就去領，且因大姊住在東京，她很有錢，所以我不曾煩惱金錢的事，不夠就去跟大姊拿，大姊再向我父親請款。當時的日本女子大學匯集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學生，除了日本人以外，也有中國人、滿洲國人、朝鮮人與臺灣人，我還遇過從新疆來的學生。臺灣人讀書讀得比較好，家庭比較好。朝鮮人比較驕傲，滿洲國和新疆人的經濟生活較差，生活習慣較不同，語言不一樣，那時候學校外國學生中滿洲國和中國人較多。當時我對日本有一點反感，認為我也是中國人，跟他們有一種特別的親密感。我們（臺灣人）與朝鮮人在學校內也和日本人不太一樣，因為被日本管得很不滿，我們都有一點不滿的情緒。

大我三年的前輩今泉和子，其父在滿洲國任職，因為待遇很好、生活也很好，所以能來讀女大，因為女大的學費比較高，今泉家兩姊妹都來讀女大，今泉和子的妹妹叫春子、大我一屆，比較沒有參加教會。今泉和子很樸素，一般女大學生們都喜歡裝扮、愛漂亮、很摩登、跟流行，今泉兩姊妹都不會，因此她們給人的「霧囂氣」（感覺）讓我很羨慕。今泉和子有一件事讓我很感動：每學期分配宿舍時，大家都要挑自己喜歡的，年級越大能優先挑選，三年級的今泉有權挑選，但她並沒有去選。我們宿舍每學期要換房間，學校有一百個四人房，每個

房間一二三四年級各住在一起，一年級的學生被叫做ベビー（baby），四年級的叫做媽媽。（註 14）我們學生朝夕相處，大家感情都很好，生活也很自由，大家都是錢人的子女，生活和錢都比較富裕，家裡常常寄很多東西過來，食物都整箱地寄送，大家都會一起分享寄來的東西。每個國家寄的東西不太一樣，像日本人會寄橘子，臺灣會寄肉乾、肉鬆，朝鮮人會寄鯛魚卵，他們的魚卵都很辣，日本九州也有鯛魚卵但較少，到了戰爭時期食物就比較少。在宿舍生活，三餐主要在學校內解決，學校提供很好的照顧，生活飲食都符合標準，不過想去校外吃也很方便自由。到學校外吃飯一定是和朋友一起，我的朋友群除了有學校內的、還有教會的，但我們比較少在外面吃，去別人家裡作客吃飯比較多。在學校晚上若肚子餓，學校附近有一間麵包店，我就會出錢請室友去買回來，我記得那時的奶油麵包蠻好吃的，另外學校附近還有一家蕎麥屋叫「地球庵」。

我們學校早餐時間大約 7 點，通常吃味噌湯這種日式早餐，午餐也是日式的，晚餐時間則是 5 點，因此到了晚上很容易肚子餓，女大學生多半手頭充裕、很會買東西，餓了就在外面買很多食物放在一個木箱，若家裡有人寄東西來也會放一點吃的在箱子，要吃大家就拿去吃。除了蕎麥麵、壽司這類日式料理外，像是法國料理餐廳這種很貴的地方我也和同學去吃過，那時候我們去比較正式餐廳前也不會特別打扮，幾個朋友們約一約就跑去了，今天想起來覺得有一點大膽，當時因為日本女大學生生活還算可以，還有一點錢可以上這些餐廳。

女大有一輛巴士會到新宿，我們從宿舍到學校都穿運動鞋，我也穿運動鞋去新宿吃飯，學校沒有制服、鞋子的規定，學校位在目白明治路，在東京有國鐵，有一站叫明治路，位於目白的學校另外還有學習院大學，我們從同個車站下車，先到學習院，走一段路後再到我們學校，在一起走去右邊有一個高高的坡。學校宿舍分兩部分，宿舍地是山縣有朋（註 15）捐獻的。

學校交通方便，有巴士可以去新宿、澁谷，也有國鐵，有時間去哪都可以，宿舍裡面是固定時間提供三餐。在澁谷有一家法式餐廳叫「双葉」，日本料理則叫壽司屋，吃飯時大家各自付，我們要畢業時，日本人沒吃過中國料理，我們一群人就叫滿一桌菜，吃得很盡興，當中還有人把整碗湯拿起來喝。臺灣人在日本開餐廳是比較晚的事，我知道高慈美（註 16）的姨丈蔡培火（註 17）在澁谷開了一家餐廳，雖然知道這間餐廳，但沒進去吃，奇怪的是，我在日本並不會特別想去找臺灣料理，感覺他們號稱臺灣料理但是很外行，不是道地的臺灣料理，所以沒興趣。

六、參與矢內原忠雄的讀經班

我在女大留學時期，曾經參加過矢內原忠雄的聖經講習會。（註 18）說到參加的機緣，前面提過我有一位三年級前輩今泉和子，有一天我去學姊房間，看到她寫的聖經班申請表。參加聖經班要先申請、很嚴格，當時不管參加校外活動或集會，都必須撰寫申請表跟舍監報告，舍監再檢查看去這裡好不好。那時偶然聽聞這個活動，因為我是教徒，聖經班聚會剛好是我想要去的，於是我也跟著學姊申請參加。我第一次去是在他學生塚本虎二（註 19）的家裡，那裏聚集了許多第一流的學生，都是東大的高材生，他們本來可以做大臣，具有考上高等官的實力與資質，但是他們都放棄當官而去傳道，我很欽佩他們。

日後矢內原忠雄設立了一間日曜學校，他在富士山那邊有個地方，有一間很普通的旅館，整間租下來讓學生去參加，這些學生不是他真正的學生，都是聽到他的名聲自己志願去參加的。矢內原忠雄有一段時間被東京大學辭退，因為沒收入生活很艱苦，過很樸素的生活，他還在

任教的時候我跟他不熟，他有另外一個活動，不反對東京大學，許多一流學校學生，如日本女子大學、東京女子大學，還是東京師範大學，這些學生都是慕名而來、主動跑來參加矢內原忠雄的讀經班，那些學生很認真，不是為了交友，是為了真理，這樣很好、讓我很羨慕，他們在神田借場地活動，類似青年會的形式，我跟著今泉前輩一起去，但是沒更進一步參加他們的活動，因為很嚴格，要成為矢內原忠雄的學生要照他的規矩。我在回臺灣前每個禮拜日都有去參加。

學校畢業後，我先在日本女子大學擔任舍監助理，因為當時大東亞戰爭的關係，學校禁止宿舍在夜間唱基督教的讚美歌，我對此感到不滿，跑去向舍監抗議，我認為基督教讚美歌是世界性的，禁止它並不符合正義，舍監無法反駁我，只能回答說風若一直吹樹、樹也不得不歪斜，來比喻在這個情況下是無法違逆時局。因為這件事的關係，我主動辭掉日本女子大學舍監助理一職，輾轉到東洋英和學院（註 20）擔任了一陣子舍監，直到 1943 年才回到臺灣。（註 21）

七、戰爭時期臺灣的生活

我在 1944 年 3 月嫁給楊基銓，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之後考上高等文官，在日本拓殖務省服務一段時間後回到臺灣總督府任職，又轉任宜蘭擔任郡守，並在 1943 年調任臺北州商工課長。我嫁給他的時候先生已在臺北州任職，沒有去過宜蘭，當時婚禮是由林茂生（註 22）幫我們證婚。

我們結婚的時候正好是戰爭最緊張時候，有「代用食」，（註 23）但是因為先生的關係，我們在日常食物上沒有太多的問題，故也沒有嘗過代用食，蕃薯簽等東西也不太吃到。我們結婚後，家中的一般飲食並沒有刻意以日式料理為主，基本上我煮什麼他就吃什麼。當時戰爭中糖果類很難取得，能夠吃到紅豆湯就很高興了，糖也無法取得。沒辦法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但有喝過彈珠汽水。我什麼都吃，所以身體好、不太生病，好吃就吃。我不太愛吃肉類，愛喝湯吃菜。我結婚之後也自己下廚，雖然結婚時有一位佣人跟著我進夫家，但佣人換來換去，所以多數時候我還是自己做菜。我沒有特別偏好哪種料理，以前在家看到或吃到什麼菜，自然就會自己做，家事自己就會做。

後記訪問過程中，劉女士看我們問得仔細，不禁笑說「你們研究還要這麼麻煩。」我們也解釋為求訪問內容正確、符合事實，必須問得詳細。訪問末尾，劉女士表示「你們來訪問我我也很高興，很多過去的事都回憶起來，臺灣有像你們這樣的青年我也很感欣慰、很感盼望。關心臺灣的青年若能繼續延續，是一件很寶貴的事情。」我們也很感謝劉女士分享了這麼多寶貴的經驗，讓我們對日治時期的女子學校教育、人民飲食生活與臺日交流有了更多具體而細緻的理解。

【註釋】1. 劉瑞山，1865 年 12 月出生於臺南，依據，《南部臺灣紳士錄》與《臺灣實業家名鑑》記載，劉曾於臺南元會境街與東巷街經營「雜貨爆竹行店」與「和源號」，和源後又稱「和源商號」，以米穀販售為主。參見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株式會社臺南新報社，1907 年），頁 56；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 年），頁 560。

2. 戰前日本女子大學正式名稱為「日本女子大學校」，儘管有大學二字，但其設立是依據「專門學校令」而非大學令，因此該校在 1901 年開校時，學制上其實為專門學校而非大學。在《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提到校方不斷嘗試希望能取得大學資格，在 1923 年亦有女子總合大學設立計畫，1930 年一度設立大學本科，但同年遭到廢止，直到 1006 年才改制為大學。中村正雄，《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東京：日本女子大學校，1002 年），頁 220-225。部分內容參見日本女子大學校史沿革：<http://www.jwu.ac.jp/unv/about/spirit/enkaku.html>。

3.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臺南：劉克全出版，2004 年），頁 374。

<http://www.laijohn.com/Laus/Lau,SSan/oldhouse/LauKChoan.htm>。

4.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現存有楊劉秀華女士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畢業證書，根據上面所寫畢業日期（昭和 13 年 3 月 15 日），加上楊女士提供之高等女校四年成績單，可往前推年份應為昭和 9 年（1934 年）。http://digiarch.sinica.edu.tw/images/a/society/view/s050_l.jpg。

5. 花園尋常小學校前身為 1898 年 10 月設立之「臺南尋常高等小學校」，位於西竹圍街內，是臺南最早的小學校。1923 年改稱花園尋常高等小學校，今則為臺南市立公園國民小學。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六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1909 年），頁 145。

6. 原先為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臺南分校場，於 1917 年獨立為臺南高等女學校，1921 年地方制度改正，該校改稱「臺南州立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22 年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公布後，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女學校改為「臺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臺南州立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改為「臺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臺南高等女學校設立訊息可參考〈地方近事臺南 高女新門札〉，《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0 月 3 日，版 3。

7. 依據《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記載，日本女子大學校學制在 1917 年有較大幅度調整，將校內各科分為文科、理科與實學科，家政學部包含在實學科內。1917 年的改革規定，家政學部學習的科目包含食物原料、食物化學、食物調查、應用營養學、食物經濟、食物衛生、料理用與實用器具廚房研究、料理、衣服原料、衣服經濟、衣服衛生、衣服調製、洗滌、染色、裁縫、手藝、衣服發展比較、居住建築、居住發展及比較、室內裝飾及設備、室內什器處理、居住經濟、居住衛生、家庭管理、家庭園藝、育兒、看護養老、社交禮法、花道、茶道。中村正雄，《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頁 185。

8. 成瀨仁藏，1858 年出生，山口縣人，1876 年畢業於山口縣教員養成所，後就任小學校校長，在同鄉沢山保羅的推薦下加入基督教，於大阪浪花教會受洗，此後 8 年間持續擔任牧師，1890 年前往美國，於麻塞諸塞州東部安東弗（Andover）就讀神學校，並入克拉克大學就讀社會學，1894 年返國，成為梅花女學校校長。他回國後以設立女子高等教育機關為目標，後在 1901 年設立日本女子大學校，1919 年因肝癌過世。臼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 年），頁 779。

9. 井上秀子（亦寫作井上秀），1875 生，兵庫縣出生，日本女子大學校第一屆畢業生，1905 年日本女子大附屬高等女學校教諭。1908 年前往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專攻教育學和家政學，又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社會學、經濟學，後又轉赴歐洲，在 1910 年回國，於母校日

本女子大學教授家政學，後在麻生正藏校長推舉下成為家政學部長。1922年任日本婦女和平協會理事長，該年受邀參加位於美國華盛頓的世界婦人軍縮會議。1928年成為日本女子大學校評議員，該年並以日本婦人會委員身分，於華盛頓「泛太平洋婦人會議」上發表日本標準生活費研究成果。1931年擔任同校學監，該年11月起因前任校長去世，至1946年11月擔任第四任校長。井上在1940年獲得五等瑞寶章，戰後一度遭到公職追放，遭禁止擔任公職。1952年財團法人大日本女子社會教育會會長，1956年就任小田原女子短期大學校長，1961年敘勳藍綬寶章，1963年去世，後追贈敘勳四等寶冠章。她著有《家庭經濟提要》、「家事教育育兒提要」。井上是日本首先開設「家庭管理」課程者，以「井上家政學」受到評價。中村正雄，《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頁512-510；日本女子大學編，《日本女子大學學園事典：創立100年の軌跡》（東京：日本女子大學，2001年），頁63。

10. 在井上秀子擔任校長以前，日本女子大學家教學部僅有兩個類組，在「家政學」專攻上，第一類需要學習食物研究、育兒、養老及看護、經濟及管理、家庭管理演習。第二類組則從「師範家政學部」改制而成，二類沒有家庭管理與經濟及管理這兩科，但多了衣服研究與居住研究。井上秀子在1933年將原先日本女子大學校內「社會事業學部」改編為「家政學部」第三類。故家政學部三類組就分為「基礎科目」、「主專攻科目」、「自由選擇科目」與「專供選擇科目」。另外在家政部第三類的介紹中，《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提及該類學生來自中華民國與滿洲國的學生較其他學部相比多出許多。中村正雄，《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頁250-251、257、260。

11. 1942年日本女子大學學生宿舍超過24間，寮生超過1千人，包含滿洲國、中華民國、爪哇與美國等國的學生。中村正雄，《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頁453。

12. 高橋誠一郎（1884-1982），新瀉縣人，1908年慶應義塾大學政治科畢業，1914年起任職該校理財科（後改制為經濟學部），1944年退職後亦持續擔任講師。自年幼時便喜愛浮世繪，並將該研究與蒐集視為一生的工作。戰後曾任第一次吉田內閣文部大臣，致力於教育基本法、學校教育法等等。1947年成為日本學士院會員，1948年至1979年間擔任日本藝術院院長，1957年至1979年擔任電影倫理委員會委員長。1962年受封「文化功勞者」，1968年母校慶應義塾大學授與其榮譽博士學位，1973年勳一等旭日大綬章，1979年獲得文化勳章。1982年去世時由日本天皇贈從二位，賜銀杯一組。日本女子大學編，《日本女子大學學園事典：創立100年の軌跡》，頁206；另相關經歷可參考wiki百科：<https://ja.wikipedia.org/wiki/%E0%AB%00%E6%A0%0B%E0%AA%A0%E0%B0%00%E0%00%0E>，2016年8月6日瀏覽。

13. 依據《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該校內寮費可概分為「普通寮」、「洋風寮」與「折衷寮」。在1940年寮費分別是4、6、4.5圓。伙食費則統一是17.5圓。參見中村正雄，《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頁458。

14. 寮生有統一的「年中行事」，有一定的住宿規範。例如1940年的寮規中提到，上級寮生依次擔任「主婦」地位，在舍監指導下使其學習家事的整理。在主婦以外，另有趣味股、體育股、整理股、營養股與經濟股等寮生職務。中村正雄，《日本女子大學校四十年史》，頁455-456。

15. 山縣有朋，1838年生，山口縣人，最初嶄露頭角之處為曾經參與江戶末期長州藩組成的「奇兵隊」，1868年參加戊辰戰爭，隔年赴歐洲考察軍事制度。1873年擔任陸軍卿，1878

年擔任參謀本部長。1885年伊藤博文第一次組閣被邀入閣擔任內務大臣，1889年首次組閣並兼任內務大臣。1892年擔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司法大臣，隔年擔任樞密院議長。山縣對外關係上，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曾反對出兵臺灣，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他則主導了日方政府對清國的政策。他亦曾經參與制訂「軍人敕語」，另外發布教育敕語也和其有一定關連性，在推動近代日本地方制度上也有所貢獻。1922年去世。白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頁1094。

16. 高慈美，1914年生，出生於高雄岡山，祖父高長是長老教會在臺灣最早的信徒及本地傳道師，父親高再祝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母親許美為許翰民醫師長女。高家兄弟姐妹共11人，高慈美排行第二。1919年，她前往東京就讀幼稚園，至1923年返回臺灣就讀小學校。1927年再度赴日，就讀下關梅光女學院。1931年進入位於東京世田谷區的帝國音樂學校（該校於1945年5月因戰爭火災而廢校）。高慈美於學校主修鋼琴，師事笈田光及教授，於1935年學成畢業。1937年，高慈美嫁入臺北大稻埕李家，與李超然（李春生曾孫）結為連理。目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纂有《恩典之美：高慈美女士圖像史料選輯》，另藏有「高慈美文書」，其中包含下關梅光女學院時期至帝國音樂學校時期日記共4冊。參見張隆志等編著，《恩典之美：高慈美女士圖像史料選輯》（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年）。

17. 蔡培火，1889年生，雲林北港人，1906年進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1910年畢業一度擔任公學校訓導。1914年（大正3年）加入臺灣同化會，隔年同化會遭解散，蔡培火也被迫離開教職，之後他在林獻堂的資助下前往日本留學，並考上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1920年畢業，留日期間接觸基督教，與林獻堂籌設臺陽中學，曾擔任《臺灣民報》編輯兼發行人。戰後蔡培火被國民黨任命為政務委員，後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參見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2000年），頁132。

18. 矢內原忠雄，1893年生，愛媛縣人，父親為醫生，1905年進入神戶中學校就讀時，該校校長鶴崎久米一與新渡戶稻造與內村鑑三為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同學，矢內原透過鶴崎校長與日後第一高等學校前輩川西實三，在信仰上與人格上的養成間接受到新渡戶與內村影響。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1917年畢業，日後回憶，自認對其最大幫助老師，在政治學上是吉野作造還有新渡戶稻造的殖民政策。1920年起回到東京帝大經濟學部任職，之後前往歐美遊歷，回國擔任殖民政策講座教授，1929年完成《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不論在當時或往後都是日治時期臺灣研究最重要的經典書籍，1937年因反對軍國主義而去職。戰後回到東京大學任教，1951年擔任東大校長，1957年卸任，1961年去世。若林正丈，《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精讀》（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頁341-348。

19. 塚本虎二，1885年生，福岡縣人，為著名基督教會傳道者。在第一高等學校時代得到內村鑑三引介，進入「柏會」。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先進入農商部省，並學習希臘語。1919年為了專心傳教而離任公職，並在關東大地震後協助內村鑑三集會。1929年從內村處獨立，在東京大手町自設「東京聖書知識普及會」，隔年刊行《聖書知識》雜誌。目前有《塚本虎二著作集》留世。フランク・B・ギブニー編，《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4》（東京：TBSブリタニカ，1991年），頁463。

20. 該校歷史可追溯至1884年「東洋英和女学校」，最初是由「カナダ・メソジスト教会婦人伝道会社」所經營，是一所基督教的學校，今為學校法人東洋英和女學院。參見 <https://www.toyoeiwa.ac.jp/gaiyou/index.html?top>，2016年4月09日瀏覽。

21. 楊基銓撰述，林忠勝校閱，《楊基銓回憶錄：心中有主常懷恩》（臺北：前衛，2000年），頁159。

22. 林茂生，臺南人，父親林燕臣為秀才出身。林茂生自長老教會中學畢業後，於1903年赴日留學，191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為臺灣首位文學士。他回臺後先擔任臺南長老教會中學教師，1927年擔任臺南師範學院囑託兼任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1927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於1929年取得博士學位。隔年回到臺灣後被任命擔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英語科、德語科主任兼圖書館館長。1943年得陳炳推薦入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擔任戰時生活部長。戰後被國民政府命令接收臺灣大學，曾任臺灣大學先修班主任，一度代理文學院院長。1945年《民報》創刊時擔任社長，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殺害。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頁164。

23. 1940年11月，日本在長期戰爭出現物資不足的情況，國內出現要求集約食物的聲音。官方在隔年4月，米開始採取配給制，並鼓勵將小麥或雜糧混入米飯中食用，稱為「代用食」，也有「節約料理」的稱呼。當時日本國內甚至舉行「代用節食米」展覽會會相關競技會。

〈（1）昭和料理再現 ぜいたくは敵「代用食」盛ん〉，《読売新聞》，2013年8月22日